

中外经济关系演变与中国 近代化的定位融合

桑 兵

近代化这一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概言之，至少应包括工业化和民主化两大特征。近代化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过程，它既不同于西方与资本主义俱进的文明增长，又不完全等于其它被压迫民族在殖民化半殖民化过程中被动强制造成的变种怪胎，而是在近代国际经济关系演变所导致的世界文明一体化进程中，在欧风美雨冲击之下逐渐展开，但同时又包含着民族对于传统的自我反省和否定。本文试图通过有关中国近代化模式问题的探讨，更加确切地把握近代化的内涵外延，找出它在中国社会环境下发展变迁的一些规律。

一、近代化的基本模式与中国 近代化模式的潜在自然形态

近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它与人类历史总进程中先此发生的几次文明更替有着明显差别。在资本主义阶段以前，人类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各系统相对隔绝和独立发展的多元文化状态，在人类文明发展总趋向的制导下，各系统循着特殊规律自我演变，结果五彩缤纷，千姿百态。虽然也有冲突融合，但多属局部性。玛雅文化所保留的大量原始社会遗迹，显示出这里的原始文明曾取得惊人成就，希腊、罗马是奴隶制的典型，而中国灿烂的封建文明则使其它民族瞠乎其右，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段文明发展的顶峰。但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对整个人类社会演变的格局与进程没有决定性影响。资本主义问世，改变了多元文化发展的格局，所以，情况大不相同，率先发展起来的西方迅速把处于不同阶段的各个系统全部拉入巨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罗网，阻断了它们独立发展的通

道。资本主义在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巨大优势，使各系统的近代文明被迫按照西方模式来展现，并且只有通过西方文明的交融贯通才能或明或暗地显示出民族的特色。这是包括基本结构和样态在内的改变，多元文化汇入一体文明，不同血缘的显著差异淡化成了同一血统的些微区别。当西方殖民者走向世界时，多数民族尚未开始向近代文明过渡，无法推测它们本应展现的姿态，因此，西方模式成为近代文明的基本模式。

可是，也有个别例外，在殖民者到来之前，那里已经处于对现存社会深刻反省的临界点，出现了否定封建主义的潜在趋势，并在社会各个领域表现出来。中国就是典型之一。在唐宋前后，社会结构便有变异性迹象，即由领主制向地主制转变，人身依附关系松动，商品经济更趋活跃，工商城市兴盛。这是明清社会变动的先决条件。到明清时期，社会的经济结构至少出现了如下变化：第一，资本主义萌芽的滋生。作为旧生产方式内部结构和社会结构诸方面变化的综合产物，它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将推动和制约社会变动。同时，作为结构样态上与中世纪西方有显著差异的中国社会的产物，它还将导致近代文明的特殊形态，即将与西方不同的新因素按照不同的排列组合形成特殊结构。第二，在若干发达区域，自然经济出现大规模解体并向商品经济过渡的迹象。乾隆时期，广东全省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已占耕地总面积的1/3到1/2，同等比例的农产品已商品化。^①自然经济开始失去绝对优势的主导地位。第三，区域性和全国统一市场已经或正在形成之中。米粮贸易是当时市场联系的主干。清乾隆朝广东省内米粮贸易活跃，有效地发挥着市场调节功能，并以广州为中心，形成一个与邻

近省区相联系的多渠道区域市场。另一个规模更大的米粮贸易网则联结鲁、皖、赣、鄂、湘、川、闽和江浙等省，标志着全国统一市场逐步形成。第四，城镇的结构、性质、功能和作用逐渐改变。中国的市镇历来是封建阶级聚居和专制统治的政治中心。尽管在一些专业化市镇工商业者成为居民的主体，城市却仍是为封建国家服务。明清之际，情况发生了变化。工商业者在城市人口中比例增加，新兴市民阶层兴起并展开初具规模的社会运动。随着市场联系日趋稳定扩大，城镇的枢纽功能愈加突出。对乡村的影响逐步增强，社会经济由自然状态向需要市场刺激引导的过渡形态演进，这样，城市除了原有功能之外，又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土壤，市场联系的中心和市民活动的基地。在一些经济繁荣区域的城镇，出现了商业资本凌驾于自然经济之上，商人势力超出封建地主贵族势力的端倪。如明代徽州“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未富居多，本富益少。”便是明显的例子。

经济变动引起思想界的层层涟漪。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开始动摇，涌起一阵重商风潮。不仅李贽等人发出“商贾何鄙之有”^②的不平之声，就连当了宰相的张居正也认为：“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穡以资商，则商病。”主张省征发以厚农资商，轻关市以厚商利农。^③农商之间日趋加强的紧密关系，使人们不能不通盘考虑。一批思想启蒙先驱和传统观念异端脱颖而出，他们政治上鼓吹君臣平等，经济上提倡工商皆本，贫富相资，思想上主张理欲合一，情欲至上。

当然，明清社会的变化仅仅是开端，远未达到引起社会变革的程度。资本主义萌芽过于微弱，市场联系的主体是米粮，自然经济虽趋解体，但投入交换的农产品仍是作为生活资料。在新生产关系形成之前，商品经济不可能最终摆脱对封建经济的依附。商人虽在一些城镇取得优势，但一遇到封建国家的强大压力和皇权的无上权威，就不免相形见绌。这说明中国本身近代文明因素的发展还很不充分。但毕竟形成一定的趋势和模糊的轮廓，并展示了向近代文明过渡模式的若干线条。由此可以推断，与这种过渡模式相衔接相适应，中国的近代文明本来存在一个潜在的自然形态，只是未能发展成便遭夭折。这种过渡模式可能具有如下特征：第一，浓重的

商业化色彩，高度发展的商业资本和商品经济成为社会变更的重要刺激。地主制经济下的土地自由买卖或使用权转证，农民与土地若即若离的关系，农业手工业生产商品化，以及广泛而紧密的市场联系，为商业资本的高度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臻于完善的封建制度，既压制商业资本，也具有更大的可容性。反过来，商业资本的状况与趋向，又极大地推动和影响新因素的增长。第二，相对内向型。由地理环境的外在影响和社会经济内在制约造成的以几大水系三角洲地区为前导的演变格局，以及沿海的对外贸易，使社会经济有向外延伸的潜在要求。明代亦商亦盗的大规模海盗活动和清代禁海与反禁海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要求。但封建国家闭关自守，不易获得外部突然性的强刺激；国内市场和沿海几大水系间的相互贸易，则为经济外涌流提供了内向循环的可能性。第三，速度缓慢而规模宏大。由于前两个原因，中国很难出现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大规模迅速分离的英国式资本原始积累，其转化将是缓慢而全面的分解过程。

二、近代中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的重新定位融合

近代中外经济关系是国际经济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后者是随着西方殖民者走向全球的步伐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建立发展起来，世界性、竞争性和强制性成为重要特征。这种以冲突对抗为基本形式的经济关系，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较量角逐。这与中国古代对外经济关系截然不同。以朝贡和封赏为主要形式的贸易往来，政治意义重于经济意义。包括郑和下西洋之类的壮举，出发点也不是经济价值。而边疆沿海的少量进出口贸易，多属以物易物的补充调剂，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十分有限。近代以后，这种经济关系依然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已成为点缀。近代国际经济关系，并不是由相同性质的双边或多边关系机械地排列组合而成，其中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交往和竞争；第二，列强对落后民族的剥削掠夺与刺激；第三，落后民族之间旧式贸易往来的沿袭与近代经济联系的初步形成。一般所说近代中外经济关系，实际上主要是指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

由于近代中国与西方在经济上的巨大差距，

二者之间不可能存在平等互惠的经济关系，一方面 是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冲击，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对落后民族的掠夺。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把一切民族都卷入近代文明。因此，衡量近代中外经济关系，不能像考察古代对外经济关系那样，仅仅站在民族的角度来分析双边关系，而要从人类社会的整体上把握其性质和趋向，用世界性眼光确定双边关系在国际经济总体系统中的位置。西方资产阶级凭借大工业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征服世界，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推行“文明制度”，“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不仅使古代社会各民族的多元双边经济关系演进为近代以西方资本主义为轴心的统一世界性体系，原来诸双边关系的机械排列变成统一体内的有机组合，而且使落后民族对外经济关系的主导由主体转变为客体，主体与客体的双向流动变为先导与后进的追踪发展。近代中外经济关系同样受这一规律的支配制约。以本体为主导和趋向的对外经济关系旧格局被打破，中国第一次因经济落后以被动的姿态受到外来冲击，第一次面临在对外经济关系中被迫以客体为流向的重大转折。

更为难堪的是，这种转折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而且必然要求社会各方面的协调适应，使中国的近代化不得不重新定位，以西方为参照系，自觉或被迫逐步分门别类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诚然，中国社会已经处于变革前夕，产生了不少新文明因素，但西方资产者不仅带来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且是经历工业革命后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突飞猛进的巨大生产力，他们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④西方资本主义以其强大的物质精神力量树立起一个典范，一个强制性座标，鲜明的对比扩大了两种文化的文野之判，本体中新旧因素的区别显得微不足道，新文明潜在模式失去了发展定型的意义与可能。近代化的重新定位改变了中国历史上文明融合的方向。再也不能以本位文化为基本定位，而是被强制向西方模式靠拢和融合，但这种重新定位后的融合，在近代社会并不导致同化，模式变换不是消灭母体，而是使之更新，产生新的民族文化。

这样一种全方位变动，对于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统一民族，的确过于严峻。人们缺乏

精神准备，社会心理极度失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在怀疑、忧虑、抗拒心理的驱动下且战且退。虽然不乏学习西方的先进中国人，但被动应付的基本态势并无根本改善，然而客观规律严酷无情，它摧毁了政治经济防线，也必然突破道德伦理屏障。“西器”、“西艺”、“西制”、“西政”、“西俗”这样一个逐级上升扩大的历程，和体用之争的演变发展，深刻反映了近代化重新定位的客观性与人们主观认识之间矛盾统一的发展过程和趋势。这样，中国近代化的实际进程具有如下特征：第一，经济越过原始积累和手工工场阶段，直接进入机器工业的工厂时期。第二，经济的传统商业色彩依然很重，但近代工业已成为核心和引导。第三，以工业化为近代化开端，而不是首先进行社会政治变革，进而推行工业化。第四，政治和社会民主化远远落在工业化之后。封建阶级掌握着对中国近代化进程至关重要的国家政权这根政治杠杆，而专制结构的杠杆既无心又无力切实推动近代化。第五，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与政治宣传同步进行，他们一开始就拥有自己的西式经典世界观。其思想的发展与其说是理论的丰富完善，不如说是对洋面孔的接受理解和适应。第六，社会结构、生活方式、道德伦理规范、价值观念等思维和行为方式虽已出现与社会变化方向一致的趋势，但变动幅度微小，不能对社会产生有力震动，促其加快节奏。因此，中国近代化的实际进程是不完整、不协调、不充分的畸形发展，不可能导致近代化的真正实现。

近代中国史是一部充满屈辱和反抗的历史，也是一部步履艰难地走向近代文明的历史。为了发掘落后的原因，人们探寻中国社会内在机制的副作用。然而，笼统归咎于封建传统未免武断。明代中国与西欧的发展水准大体接近，但节奏却缓于后者。其必然原因，毋宁说是封建主义过渡发展。而且，历史演进的加速延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偶然性。英国革命影响了法国，拿破仑战争又摧毁了欧洲大陆的封建堡垒。而中国却出现了动荡反复。农民起义的烽火，满族南征的硝烟，长期战乱，使社会经济严重凋敝。此后清王朝进一步加强完善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体系，强行闭关锁国，压制商民，大兴文字狱，使思想界的活跃横遭腰斩，陷入沉寂，略有抬头的民间势力倍受压抑，一蹶不振。当量变积累终于要再度打破僵局时，西方列强已经走来敲开国门了。这

就使中国失去了自我发展近代文明模式的可能，被迫以西方样态走入世界一体化。

然而，社会内在趋新势头在强化专制统治下，可能暂时被遏抑，却不能根本逆转。西方入侵阻断了某些新因素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在延续中注入新的模式。不同民族的近代文明因素尽管样式千差万别，本质上却不无共同之处。在一定抽象意义上，甚至可能如出一辙。清前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行业，在鸦片战争后大都维持下来，其中有很多向机器工业过渡。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缫丝厂，不过是添置一些洋机器（而且在生产过程中不一定起主导作用），就跨入近代工业的行列。钱庄、票号和各种商业也逐渐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贩卖洋货显示中国商业进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与机器工业的联系则意味着它与产业资本的结合，这是中国商业近代化进程的阶段标志。自然经济解体并向商品经济过渡的趋势依然延续，并在资本主义的直接刺激下，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国内市场继续发挥作用，洋货输入离不开原有市场；而在原料、销售、劳动力三方面，近代工业几乎是坐享其成。随着商埠开通，铁路敷设，市场的空间位置有所移功，但基本格局未变。上海开埠后，宁波外贸商将基地上移，便形成了势力最盛的宁波帮，而所从事的活动一如既往。城镇发展变化一直延续，商人和其他市民的优势日益明显。沪、宁、汉等大都市的商业结构，直到清末仍以传统的盐、茶、药材、杂货、粮油、棉花为大行，以钱、当、栈为大业。^⑤商帮及会馆公所等组织，也多由古代沿袭而来。近代出现的产业资本家、工人、学生等新兴阶级、阶层，与商人、手工业者及士绅的转化密切相关。思想界虽一度消沉，却是暗潮隐伏。以经世派为代表的开明士绅师承前人，发出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声，要求打破“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正因为这些具有新趋势的社会力量和思想因素的存在，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原来促成自我演变的动力转而推动人们关注外来新事物，中国才能如此敏捷地对西方冲击作出与社会发展趋势相吻合的反应。最后，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依然延续。沿几大水系由东向西以及城、郊、乡的辐射网，与外部冲击的势头刚好合拍，因而更为加强。事实证明，简单地把它看成是半殖民地的畸形产物，人为加以改变，违背了客观规律。

模式变换使自然演进带上了冲突的浓烈火药味，新旧因素斗争和土洋、中西的碰撞搅在一起。但是，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所提供的单调产品，已经抵挡不住本国商品经济的冲击，满足不了商业化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更难以把物美价廉、丰富多样的西方机器工业产品长期拒之于国门之外。所以，西方商品遇到的第一重障碍，就是中国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的抵抗。尽管后者难与匹敌，力度却比自然经济强得多。不同文化系统之间存在着排他倾向，即使处于同一文明阶段，也会有因文化背景不同而形成的心理对抗。况且阶段相同还有程度差异，先进与落后之间同样存在相互排斥的一面。过渡形态的近代中国包含着处于不同文明阶段的各系统文化中的多种因素，封建经济不能与资本主义的巨大优越性抗衡，必然解体。而不同系统中的相同文明因素经过撞击融合，传统中孕育的新因素揉进西方模式，成为中国近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使得中国的近代化在西化框架内顽强地表现出民族特色，在反应节奏、速度、样态和结构方面，与其他民族的近代化进程有所区别。

指出近代文明潜在自然形态的意义，同时强调重新定位的不可避免，旨在说明中国近代化的特殊复杂性。对于世界，客观进程并不一定是最佳选择，却是历史的必然。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被迫按照西方近代化模式进入世界一体化的近代文明，的确是极其痛苦的历史过程。但是，任何民族只有首先进入一体化新文明，才能展现其民族特色。融合只能在新的定位下才会朝着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行进。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必然发生分离解体。尽管没有外来侵入，它可能按照不同的样式演变发展，但历史客观进程使这种可能性失去了变成必然的条件。因此，自觉地接受世界冲击非且不会导致民族沦丧，相反，是获得新生的必由之路。

三、中国近代化诸关系思辨

近代化模式交叉更替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的出现，使中国的近代化陷入复杂关系的纠葛之中。近代化与传统、西化与民族性、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半殖民化与独立主权这四组矛盾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紧紧地绞扭在一起，给人们的认识造成极大混乱。包括那些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都没有予以辩证地解决。因此，有必要进

行延伸考察。

第一，近代化、传统、西化、民族性的关系。中国近代化对传统的否定，不是单线进行，而是双重否定。其一，民族的自我反省和否定扬弃。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的转化趋势及其过渡性潜在自然形态，说明近代化对传统的否定同样是民族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其二，西方的冲击。从近代化角度看，这种冲击由近代国际经济关系的性质与格局的演变制导，是世界不可避免地以西方为轴心和样式，逐步进入一体化的结果。这一客观进程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自我中心定位和历史文明融合的流向，整个民族被迫面向世界，面向西方。不仅打破封闭，而且由内聚型开放转变为外向型开放，即在吸收的同时发生移位和结构、性质变化。重新定位虽然融入民族的新文明因素，也是按照西式框架进行组合。然而，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强烈的民族主体意识，这种由各种复杂因素混合而成的统一体，与近代社会的不协调具有整体性，孤立看待其中各个部分，很难判断优劣善恶。一旦联结为整体，就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效应。因此，不能以与民族意识的适应性对传统进行取舍。要实现近代化，必须对传统进行冲击震动，在运动过程中实现去芜存精的自然淘汰选择。世界历史证明，后进民族传统中的优秀部分以及能够适应和促进新文明发展的部分，即使在同化中也会留下深刻印记。

事物具有或然性，往往产生双重作用。传统的价值越高，建立民族新文化的基础就越雄厚，但走向近代化的脚步可能越缓慢。民族精神越强，学习西方的勇气越大，但面对世界的包袱可能越沉重。近代中国的教训，恰恰是保留太多，创新太少。主张学习西方最力的个人和集团，正是民族主体意识最强、近代文明程度最高的个体与群体。他们对传统的偏颇失误，在于把理想当成现实，趋向等同实际，没有充分考虑人们的心理承受力。另一方面，传统的强劲凝聚力使他们也频频反顾，从离异到回归，却未实现否定之否定，由传统始，以传统终，最后拜倒于批判对象的脚下，落得个时代落伍者的悲剧结局。传统成了民族的象征，国粹学派的一代名士企图以此抵制全盘西化倾向，结果自己反倒受不住诱惑，做了传统的俘虏。不仅如此，人的回归与文化的回归交相作用。不改造传统的封建结构，凝聚力将使新事物与旧内核相适应，或把旧东西贴上新标签，

甚至出现逆向选择吸收。传统可以使中华民族不死，而进入世界一体性的近代化才能获得新生。在文明阶段更替时期发生的文化融合中，不同系统的互补只有在新的形式之下进行，才有可能顺利发展。否定传统与学习西方，正是民族更新缺一不可的必要条件。

第二，近代化与资本主义、半殖民化的关系。近代化伴随着资本主义来到世间，但又不同于资本主义。它一方面表现为社会发展和文明进化的运动过程，一方面体现为物质精神文明的成就与结晶。在这两个方面，近代化与资本主义都不完全重合。从结果上看，资本主义制度作为阶级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必将走向衰亡，为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而近代文明发展却是各个阶段成果的叠加。它不仅不会随着资本主义衰亡而退化，反而经过蜕变使之长入新文明，融合于人类文明的总体之中。从过程上看，近代化与资本主义的开端存在间距，在17世纪甚至更早，资产阶级就已经建立统治，推行资本主义制度，开启了近代化的方向。但近代化的严格界标——工业化和民主化并非与此同步发生。工业革命开始时资本主义至少已有百余年历史，政治民主化更是由于法国大革命才风靡欧洲，使长期把权力交给封建势力看管的英国资产阶级也受到反冲击。资本主义的发展呈抛物线，有一个发生发展到衰亡的历史过程。而近代化则是逐级上升扩大，与社会制度的变更也无直接关系。此外，在一定条件下，社会形态的更替可能出现跳跃，资本主义并非实现近代化的唯一形式，它可以通过更为先进的形式来完成。而近代化却是无法逾越的客观进程，社会文明的进化只能逐步实现，没有近代化与之俱进，跳跃之后必将引起停滞甚至倒退。

近代化在中国是一个未完成的历史过程。列强的侵略干涉，封建统治者在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之间的徘徊反复，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使近代化在夹击中走上半殖民地化的歧途，产生了一个畸形怪胎。通过资本主义在中国实现近代化的梦想落空，增强了改变国家政权性质和民族地位的迫切性。但是，政治领导的变更可以影响近代化的成败，却不能决定其有无。同时，尽管近代化与资本主义不等同，毕竟又有历史渊源和内在联系，不能忽视或否认二者的关系。这样，近代化在中国成了一个悬而未决又急待解决的问题，留待继起的先进阶级。

第三,近代化由阶级社会的更替发端,而资本主义以血与火的文字载入史册。它以暴虐鼓进了开化之风,文明与野蛮、历史进步与道德沦丧联袂而至,动力与惰性难分彼此,加之中国近代化被迫以西化为定向,却结出半殖民地的怪胎。它全面冲击和大胆冒犯传统的威严,却得到令人沮丧的结果,福也是它,祸也是它。这究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历史进步的逻辑,还是古老文明的沉沦,伟大民族的灾难?代近化、西化、资本主义、半殖民化与传统、民族性、封建主义的掺杂混合,中西文化撞击融合与社会形态交替过渡的纠结,使得惯于用道德标准来评判社会现象的中国人失其所据,目光惶惑散乱,不知如何应付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能否把握这些复杂矛盾的辩证关系,对近代人的历史作用影响极大。每一个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都不能不对此表明态度,但没有一种差强人意。农民把排外与疾新混为一体,以反对一切洋的或带洋味儿的人、物、事来表达对民族和自身生死存亡的本能危机感。封建统治者接受工业化而抵制民主化,这种有限选择及其在阶级、民族利益间的权衡取舍,恰恰堵塞了近代化的成功之路。一些进步人士希望实现近代化同时防止西方社会弊病的主观愿望固然不错,但把传统中的理想成份当作医治近代社会痼疾的灵丹妙药,却是南辕北辙,要么成为空想,要么导致倒退。西方社会问题是资本主义发展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只有经过社会自身矛盾的对抗运动,产生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更为发达的物质精神文明才能消除。而道德规范受历史困袭的制约影响,用以衡量对传统的自我否定,已经显得格格不入,掺入中西冲突,就更如

冰炭水火。在这个交替与融合相重叠的复杂社会里,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处于移动重建过程,具有相对性。因此,解决道德与进步之间的矛盾,不能在伦理的范畴内寻找途径,也不能依据冲突系统各自的状态加以判定。应当克服道德心理障碍,用发展的世界眼光展望趋势,真正把握客观进程的必然方向,通过文明进化、民族兴旺、国家强盛,使社会达到新的和谐统一,恢复民族曾经有过的博大胸襟和宏伟气度,唯有如此,才能一劳永逸地从困扰中解脱出来。对近代化至关重要的社会势力(包括新生产关系的代表,掌握政治杠杆国家政权的统治者以及近代化的前导知识分子)在行进中常常因此出现情后现象。而在社会心理承受力与发展趋向的选择中更偏向于前者,这正是中国与日本近代化进程主观上的显著区别和成败得失的关键所在。

-
- ① 陈春生:《清代乾隆年间广东的米价和米粮贸易》(中山大学硕士论文)。
 - ② 李贽:《焚书》卷二。
 - ③ 《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明张文忠公全集》文集八。
 -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 ⑤ 杨荫杭:《上海商帮贸易之大势》,《商务官报》第12期;徐焕斗:《汉口小志·商务志》,《江宁商店总数表》,《商务官报》第10期。

作者单位:华中师大

责任编辑:林有能